



章启群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教育必须推倒“三座大山”

□章启群

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难以估计的。举一个极端例子。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16岁的高一学生李明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李明,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可以改变。这种血泪呼喊,直指现存的教育制度!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教育不是那种培养少数精英而伤害大多数的教育。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第二是消磨了一些优秀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读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科学创造的一个根本动力就是兴趣。这是我们教育毁灭人才的根本所在。

第三是人格教育几乎空白。不能说中小学没有德育和素质教育,但是,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现在的大学生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经历挫折,难以承受打击。大学生精神出现问题的不少见,高校自杀的学生有小小的数字,而且正在呈上升趋势。

“三座大山”,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人们把孩子的未来当做家庭的唯一重心,而且,这个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

家庭和教育的这种观念,首先让中、小学老师产生巨大压力,他们也别无退路。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由此也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名牌大学附中的校长,比该大学校长还牛气!

其次,“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的扭曲,学习成绩也被当做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被家庭和社会压抑得抬不起头来。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家庭压迫往往成为摧毁孩子精神支柱的最后一击。

社会和家庭的这种观念,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三座大山”的关系是:“官本位”是基础,它维护“应试教育”模式;“应试教育”模式直接产生危害;而家长和社会观念虽是被动,但推波助澜。

中国教育必须要推倒这“三座大山”。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首先是巨大的教育官僚集团。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其中大部分人就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我们发现:近十几年来的所有“教育改革”有一个特点:越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权力越大。所以,他们非常热衷于这样的“改革”,不亦乐乎!

其次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的附庸,捞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现在大家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暴利。

第三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他们实质上也是一种官。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

因此,希望现行的教育部门来推倒这“三座大山”,只能是痴心妄想。

怎样才能推倒这“三座大山”?

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营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们只有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

因此,中国教育要推倒这“三座大山”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投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推倒“三座大山”,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我们作一个个案分析: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第一,燕大只需用与美国教授同样的薪水(年薪8万美元),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杰出的华人学者。这个年薪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下国立大学教授和长江学者的年薪。因此,即使像北大、清华、复旦等最好的高校等都无法与之竞争。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它可以单独招生或参加统招)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首先,它会产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的。这就给学者们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方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学术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产生学术影响下获得的头衔、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定,出现这种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

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大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北大、清华、复旦等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否则它们将自动出局。因此,它们也必须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官僚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现在北大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000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1/25。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那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做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出现这种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

外的教育资金。现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学生留学海外,仅2009年就有29万多人。这些人中拿到大学奖学金的不会超过3万元,全额的甚至不会超过1万元,自费生约26万多人。初步估算,一个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自费读大学的孩子,每年的费用约人民币20万元。按照大学4年毕业计算,每年中国大陆流出的教育费用至少是:20万×26万×4=2080亿,即208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里很多是读中学的,还有读研究生的,所需时间更长,费用更大,再加上半奖奖学金的人,还有29万之后的数以千计的人数,等等,数字会更大。

208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现在“985工程”大学(北大)每年国家投入6亿元,“211工程”大学每年国家投入不到1亿元。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建成花费20亿美元。如果用每年流出的2080亿元,近期可以至少建立100所“985工程”大学,1000所“211工程”大学。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规模的私立大学,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再设想:新建100所“985工程”大学,1000所“211工程”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高考还会这样玩命吗?这应该是解决应试教育弊病的根本办法。那些试图通过增加高考的次数的办法,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的压力和负担。

当然,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还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我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

相关的:钱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0年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到GDP的4%。而且,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闲置、浪费和外流的经费又令人触目惊心!

第一是存留在海外的教育基金。欧美过去在中国开办的学校不下上百所,著名的大学也有几十所。解放后我们停办了这些学校,但这些教育基金应该还在,而且是一笔巨大的经费。仅仅燕京大学仍然存在的基金,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同济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笔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第二是现在在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



大学档案 清华百年记忆

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教育规律——蒋南翔的教育思想

□史轩

政治辅导员的清华毕业生中,不少人成长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优秀骨干、勇攀科学高峰的学术精英。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华大学的校领导都曾担任过政治辅导员,许多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毕业生后来来到企业、科研院所和党政机关成为领军人物。

“给干粮,更要给猎枪”

1962年,在一次研究生座谈会上,蒋南翔在谈到学生在学校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时,提出了“干粮与猎枪”的比喻。他说,如果学校给予学生的只是一些“干粮”,那么“干粮”总是要吃光的,如果给学生的“猎枪”,学生就可以自食其力,将来就不会发生饥荒了。这个比喻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异曲同工,意在要求学生既要打好猎枪,也要培养能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创新能力都是不能缺少的。

蒋南翔一直非常重视基础课程教学。学生在学校里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但重点是要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一个学生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宝塔型”的,越是基础理论越要厚实。为此,学校在教学组织上专门成立了基础课教学研究部,加强对基础课程的组织领导。蒋南翔曾强调,清华本科生的基础课学习要达到研究生水平。因此,他在教学计划中设立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他同时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强调清华本科生既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有基本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具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毕业后才能够独立学习、独立工作、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教学、科研与生产三结合”

清华对于学生的学习,始终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于科研则必须走结合生产实践的道路。从1958年开始,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结合实际的工业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任务进行。例如土木工程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是完成一个无线

电桅杆塔的设计,他改进了塔身结构,节约了大量钢材,被生产部门采用。建筑系毕业生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水利系师生则承担了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

1958年,水利系全体毕业生接受北京市委托,集体承担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密云水库是华北第一大水库,地质情况复杂,20万民工施工,工程包括了7座大坝和副坝、两条隧道、两条溢洪道及两座水电站,要求1958年动工,第二年基本建成。承担这样大的工程建设任务,对于清华大学乃至全国高等学校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水利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4个月内就完成了设计任务,经验合格很快正式投入施工。水利系师生自豪地称自己的工作为“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

在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同时,蒋南翔仍然强调以教学为主,力求防止过多的劳动,及时纠正偏差。他提出的目标是,“把我们的学校建设成为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者联合的先进基地”,办成“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浓缩了清华大学的精神,也成为清华人的奋斗目标。

清华从建校伊始就以重视体育而闻名,蒋南翔校长则把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并作了重要发展。1956年,蒋南翔在阐述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基本方针时指出,青年人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还不一定能很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还要有健全的体魄,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毅力。

1957年11月29日晚,在西阶梯教室召开的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上,蒋南翔校长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除了要培养青年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业务的人才外,还同时必须是体魄健全的能劳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在蒋南翔看来,这样的要求既可以磨炼同学们的意志品质,也能够激发他们的责任意识。



1962年蒋南翔与毕业生的合照

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

教育危机的第一个方面:人才培养。这也是钱学森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一个非常尖锐的事实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所有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的中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钱永健、丘成桐、陶哲轩)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现在中国大陆的小学、中学、大学无关。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数大约400多万。在大陆受过教育的30到40岁的中国人大约在1亿以上,却没有一人能获得诺贝尔、菲尔茨奖。

教育危机的第二个方面:人格教育失败。简单就是说没有礼仪廉耻教育。表现的激烈:一些大学教师、幼儿园儿童被杀。

表现的广度: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人格教育一样失败。例如:没有平等意识,只尊重对他们有用的人,不敬业。

这些问题根源都在于教育。因为,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

任何人都知道,河流的上游如果污染了,下游在劫难逃。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条河,那么,教育就是这条河的上游。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道路就是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产生终生的影响。

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实质上他们没有受到完善的人格教育。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野蛮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

教育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社会生活的上游就被污染了,所有的其他社会问题必然暴露出来,这是下游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

窒息中国教育的“三座大山”

当前中国教育不是常态,导致的根由,我归纳为“三座大山”:“官本位”的教育体制,“应试教育”模式,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

第一座“大山”: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我们用“计划”无法管理经济,怎么可能用“计划”来管理教育呢?质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

第二座“大山”: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过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

“应试教育”的危害直接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实质上,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让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

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种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